

日本古典与 现代文学研究

■ 张彬◎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日本古典与现代文学研究

张 彬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古典与现代文学研究 / 张彬著. — 北京: 中

国纺织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80-4528-0

I. ①日… II. ①张…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
近现代 IV. ①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1412号

策划编辑: 武洋洋

责任印制: 储志伟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A407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4

销售电话: 010-67004422 传真: 010-8715580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e-textilep.com

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http://www.weibo.com/2119887771>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125

字数: 200千字 定价: 79.5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前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有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延展，文学作品的文化解读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最初，研究者一直倾向于去理解作者写作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一直坚持这样做，因为这一环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对于初次涉猎文学的人来说，对作者本人及当时文化社会环境的了解是接受外国文学，特别是接受日本文学的一剂特效药。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村上春树，除了其作品本身受众的原因以外，想必也是因为其后现代主义是属于 21 世纪的新文化，是属于年轻人的，与之相呼应的文学作品必定具备新文化之价值，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真正认识日本文化”应该是深入研究日本文学的永恒命题。了解文化背景和作者，是理解文学作品的初步和基本手段。研究者可以通过了解作者写作时的社会文化状况，探求作者的写作意图，通过对作者本人的了解，去分析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文学理念，以进一步深入解构作品。文学作品写作的时代有所不同，作家经历的人生也是全然迥异的。的确，在大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学作品均是应时代而生的，均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日本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以中国文化为蓝本进行文化的构建，因此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很多实质性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以文化为切入点，寻找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通之处，能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实际，从而探求日本文学意义之所在。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存在着远比以前更多的相似点，但同样，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直接感受到两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是一个与中国既相似又极不同的国家，其文化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其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多角度深入认识日本文化，对多层次地解读日本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以现代日本文化的视角，再加上现代中国文化的参照，对日本既有文学进行再解读，这一课题值得研究。

由于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内容广泛，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使之日臻完善。

作者

2018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文学的起源	1
第一节 诸种文化混沌期与口头文学	1
第二节 引进中国典籍与文字文学的诞生	4
第三节 从古代歌谣到《万叶集》	7
第二章 贵族社会与散文文学	11
第一节 散文文学的诞生	11
第二节 物语文学高峰之作——《源氏物语》	16
第三节 随笔文学的鼻祖——《枕草子》	21
第三章 武家社会与文学	25
第一节 战记物语及其代表作——《平家物语》	25
第二节 《方丈记》《徒然草》与随笔庶民化	29
第三节 俳句的流行与松尾芭蕉	33
第四章 日本通俗文学的流行	38
第一节 通俗文学的流行及其类型化	38
第二节 井原西鹤与“浮世草子”	42
第三节 上田秋成与《雨月物语》	45
第四节 式亭三马与《浮世澡堂》	47
第五节 曲亭马琴与《八犬传》	49
第五章 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	52
第一节 启蒙思潮与近代文学	52
第二节 森鸥外等与浪漫主义文学	58
第三节 田山花袋等与自然主义文学	60
第四节 白桦—新思潮—新浪漫三派鼎力	63
第六章 日本现代文学的探索	69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学与小林多喜二	69
第二节 新感觉派与横光利一	72
第三节 现代诗歌与戏剧	75
第四节 战争黑暗时期的文学	79
第七章 日本现代文学的重建	82
第一节 战后民主化与战后文学	82
第二节 存在主义的再传播	87
第三节 现代文学三大家	92
第八章 日本的“家”制度与文化结构	101
第一节 日本的“家”制度	101
第二节 家族国家体制	108
第三节 日本的“家元”制度	111
第九章 日本饮食文化	117
第一节 日本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	117
第二节 传统的日本料理	125
第三节 日本饮食文化的特征	129
第四节 日本的酒文化	133
第十章 日本文化遗产	139
第一节 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	139
第二节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	146
第三节 日本自然遗产	150
第四节 日本文化遗产	151
第十一章 日本传统宗教文化	163
第一节 天孙降临与国体思想	163
第二节 天皇崇拜与儒家“忠孝”思想的结合	165
第三节 天皇成为象征	166
参考文献	168

第一章 日本文学的起源

第一节 诸种文化混沌期与口头文学

日本最原始的信仰，是以山、树木和岩石等自然物体为对象的。从奈良县三轮町大神神社一带发现的最古老的祭祀遗迹来看，三轮山的南麓、西麓由巨石组成磐座，上面置有滑石制玉类和土制祭器等物，这是将三轮山体作为“神体”来祭祀的。这类遗迹相当多，以“自然灵”和“精灵”为对象的祭祀，就成为上古日本的一种仪式，开始萌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同时，当时有这样的习俗：制作女性为主的土偶，特别突出其生殖器，制作石棒象征男性的生殖器官，显示出一种神秘的创造力。还有陪葬物——原初的人神同形的小土偶，含有咒术的意味，可见上古日本先人开始对“死灵”有了朦胧的认识。

从中国传入青铜器、铁器和农耕技术以后，日本迎来了以金属器为特征的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和人的群居生活品质的提高，日本上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对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信仰以自然物为对象的“自然灵”和“精灵”，变为信仰与农业有关的“稻田神”。当时的祭祀以农事为中心，祭祀的内容千差万别，包括对人的生与死、生殖、成年、葬仪、镇火、住行等。比如，火焰纹土陶器以火焰纹饰，表现了原始人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的力量；陪葬的土偶，以女偶为主，含有与女性生殖能力结合的要素。同时，根据某些出土土偶的姿势来判断，也有似是表现咒术者的念咒姿态。因此，可以想象这个时期已有向神念咒的场面，即原初祭祀仪式的萌芽。这反映了当时原始人对“死灵”与“生灵”的认识有了提高，转向了对“死灵”的信仰，开始从咒术的阶段走向祭祀的阶段。

上古的日本原始人相信语言的生命力和感应力，相信语言具有灵性和咒力，就是具有内在的神灵。于是便试图通过咒术的手段，达到他们实现人的最原始本能的求生克死的愿望。所以，未开化人举行咒术的仪式，通过咒语，以感应自然界，求得生的渴求、灵魂的救济和共同体的安定。他们以为这种种愿望可以通过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界对人的相互交流和感应作用而达到。未开化人的这种生活和行为，都是受咒术支配的。咒术分为黑咒术和白咒术。在《古事记》中，关于黑咒术，有这样的记载：在兄弟海幸与山幸的神话故事里，弟山幸弄失了兄海幸的钓钩，山幸破剑，做了500个、1000个钩作赔偿，海幸都不要，偏

要原来的钓钩。山幸求助于海神，海神从鱼群中找回那个钩，交给山幸，并授予咒语“这个钩是烦恼钩、着急钩、贫穷钩、愚蠢钩”，以对付海幸。山幸按海神所教，将钩还给海幸时念了上述咒语，从此海幸更加贫穷，并起了恶心，攻击山幸。山幸拿出涨潮珠来溺死他；他哀求时，拿出退潮珠来挽救他，使他受苦以作惩罚。另外，在《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中还记述了不少神颂土地和人生光明的咒语，这些属白咒术。

这种咒术所使用的语言，与日常性的具有传达意思功能的语言不同，是神授的语言，有感应的功能，语言更加洗练化。作为最原始的咒术宗教的发展，咒术仪式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充实，形成了多样的性格。从咒术内容来说，有祈愿渔猎丰收的经济行为、维持共同体安定的政治行为，在个人的抚慰救济灵魂这点上又有宗教的行为。从形式来说，有语言的部分，这是咒术祭祀仪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有行为部分，就是念咒时的手舞足蹈。从内容与形式的总体结构来说，它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现象，也是一种作为口头文学的咒语和作为原始歌舞未分化的文化现象。由此可见，咒语这种最早的“言灵（语言的精灵）信仰”，是以语言作为表现媒体的文化和文学的胚胎，咒术的内容与形式成为文化整体未分化的母胎。咒语为口头文学系列之一。

作为口头文学系列之二的日本神话、传说，其本身也是“言灵思想”的产物。这一口头文学的生活意识，究其原型都可以还原为“言灵思想”。古代文献的“神代记”所载大国主神创造出云国，特别提到：“乃兴言曰，‘夫苇原中国，本自荒芒。至及磐石草木咸能强暴。然，吾已催伏，莫不和顺。’”同时提到：“然，彼此多有萤火光神及蝇声邪神，复有草木咸能言语。”这里所载的磐石、草木是十分理解“言灵”的。它们以此对抗强暴或邪神，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现实的要求，其实现的方法是把人的语言能力理想化。《续日本纪》也写道：“日本这倭国是言灵丰富的国家，有古语流传下来，有神语传承下来。”这说明日本神话、传说这类口头文学“向佛也向神”，以神为主流，用自己独特的“言灵”来探索宇宙的开辟、神灵的显现、人类的起源、国土的创造等。

也就是说，上古先民生活在原始的状态，对混沌的世界不甚了然，把许多未能把握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归结到“神代”的事，将一切神化，以此对种种混沌的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因此，日本神话分为四大类：天地创始神话、自然生成神话、文化始源神话、风土神话。《古事记》就这样记录了天地始分的混沌状态：“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漂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便化为神。”这段神话，在说明天地是对等的世界时，将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作为阴阳的体现，伊邪那岐是天神、伊邪那美是地神，通过他们的和合，生成绵亘天地的世界和万物。

从作为口头文学系列之三的原始歌谣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初是从一种对生活的悲喜的本能感动发声开始的，比如劳动的配合、信仰的希求、性欲的冲动和战斗的呼号，内容多为殡葬、祭祀以及渔猎、农耕、狩猎、战斗、求婚、喜宴等，与上古人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纯粹是一种原始情绪和朴素感情的表现。古代的原始歌谣，在未形成独立歌谣之前，是与咒语、祝词、神话传说相生的一种复合文学形态，同时也是一种诗歌、音乐、舞蹈的混合体。

据考古发现,飞鸟时代(538—645)古文字的前文、后文,字数比较完整,都留下来夹杂着类似原始歌谣用字的痕迹。但最早出现文字记录日本原始歌谣的,则是我国的《魏志·倭人传》一书。书中记有倭国在葬礼上载歌载舞的文字:“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魏志》于3世纪问世,说明当时日本在殡葬仪式上已有伴随舞蹈唱“歌”的习俗。同时《日本书纪》叙述天之若日子的葬礼时也写道:“如此行事,八日八夜,悲歌曼舞。”这再次说明,在文艺诸形态未分化之前,古代的原始歌谣与祭祀的咒语、舞蹈等混同,与神话、传说共存,它尚未成为独立的歌谣,是一种最简短、最原始的口诵形式。

在《古事记》中海神从鱼群中找回那个钩交给山幸所授的咒语“烦恼钩、着急钩、贫穷钩、愚蠢钩”,以及《日本书纪》中火远理神失去了钓钩,海神教他归还钓钩给其兄时的咒语“贫穷之本,饥馑之始,困苦之源。贫穷钩、灭绝钩、衰落钩。大钩、猖獗钩、贫穷钩、愚蠢钩”,就是带原始歌谣性质的发声。上古过着渔猎生活的人,称作“隼人”,故将这种原始歌谣称作“隼人歌”。

《古语拾遗》记载的古代原始歌谣,形式由单行构成,开始有声无意,用极其简单的句,形成歌节,比如,阿波礼由“啊”和“哟”这两个感叹词组合而成,即随着劳动、战斗、信仰、性欲等冲动,发出或悲或喜的自然叫声,即发出一种本能的、无技巧的感叹声。在文化混沌时期,其他文学诸形态未出现前,只有这种实为感叹词的“歌”的存在,这是古代歌谣之始源。

可以说,这种感叹最初是出于对人和自然的感动,其后发展到对现实的接触、认识、感动,最终变为感叹。“阿波礼”用日语汉字标示为“哀”字,具有悲哀感情的特定内容。正仓院古文书列举了用万叶假名写出的“春佐米乃,阿波礼”的例子,体现目睹春雨所感受到的“哀”的氛围,是一种极其纤细的哀伤感情的表现。还有与“哀”的感动相反意思的欢快喜悦的感动,比如《古语拾遗》记载天照大神从天岩户再现的时候,上天初晴,众神皆面露喜色,手舞足蹈,连续发出欢喜的感叹声:“哀”(即“啊,哟”),“阿那,于茂志吕”(即“啊,好有趣”),“阿那,多能志”(即“啊,好快乐”),“阿那,佐夜憩”(即“啊,好清明”)。这是日本现存的少数几首最原始的歌谣之一,它的用语多为感叹词,近乎一种咏叹的表现,是在无意识中发出来的无技巧的咏叹,句数不定,形式也不定型。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它由四句组成,前两句是三六形,后两句是五七形,是对日常生活悲喜的感叹和对美的感动表现,是一种纯粹的感情在起作用。就是说,这种古代原始形的歌谣,完全是单纯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不具备诗歌形式的完整性,创作的动机也不明确,只能作为生活意识(包括对人、自然、爱情的生活意识)而自然流露出来。但是,它们有强烈的传承性,成为日后各种文学艺术美形态和文艺意识生成的母胎。

古代歌谣首先是《古事记》收录的从“神代”至显宗天皇时代的113首,《日本书纪》收录的从神代至天智天皇时代的128首,其中与《古事记》重复约50首;其次《风土记》26首、《续日本纪》8首、《日本灵异记》9首、《日本后纪》2首、《古语拾遗》2首、《正仓院文书》

1首、《歌经标式》37首等，前期万叶歌中也有若干是属于古代的歌谣。由此可以说，古代歌谣大部分是属于《记·纪》歌谣。

就现存文献来考察日本文学的起源，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感动起源说、性欲起源说，认为文学完全产生于个人心理动机，即由人的心理本能的感动而产生，比如对自然的感动和对性欲的感动而产生的原初歌谣；另一类是信仰起源说、劳动起源说，认为是产生于社会的动机，即由共同体的生活行动需要而引起的感动所产生，比如信仰生活仪式等需要而产生的咒语、祝词，在战斗中、劳动中产生的原初歌谣，它们成为最初的文学艺术，都不是出于纯粹美的动机。前者是个人内部的动机，后者是社会外部的动机，无论哪种动机，如果要将语言的表现构成文学，离开人的喜与悲的感动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有内部动机，人的心理本能离开了外部事件的触发，就很难引起感动，也就不会产生文学；同样，如果只有社会的动机和外部的触发，没有引起感动，也不会产生文学。只有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交叉作用才会产生文学。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将文学起源归结为哪一种动机，包括通常的劳动起源说，文学只有在以上各种动机的相互关联中才能产生。

所以，从最初产生文学现象起，内部与外部、个人与共同体、事件的触发与感动的产生、口诵与歌舞等多组的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综合的运动过程。文学和文学史发生的可能性，存在于这个运动的过程之始与之中。口头文学便这样开始在人类历史上占有自己的独立的一页。

概而言之，根据上古的文物发现及其后的文献记载，上古以前，日本仍然处在诸种文化的混杂状态，文学尚未从历史、政治和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笼统地包容在整个文化中，处在混沌的阶段。

第二节 引进中国典籍与文字文学的诞生

日本从口头文学到文字文学的发展，有赖于汉字的传入和日本文字的产生，尤其是汉籍的初传日本，对于推动文字文学的诞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汉籍初传有种种说法，但文献涉及者，主要有徐福赴日初传、神功皇后从新罗带回、王仁上贡《论语》和《千字文》等三种说法。《论语》、《千字文》是儒学和汉字在日本普及的启蒙书籍。在日本文献上，以重视这一说者居多。《古语拾遗》记述了大和朝廷在王仁献书之后，初设“藏部”，收藏包括汉籍在内的官物。据这些文献记载，在大化（645）之前，日本的教育主要以儒学和文字教育为基础。

6世纪的继体天皇时代，传入了更多的儒学书籍。继体七年（513）五经博士段杨尔、3年后五经博士汉高安茂先后赴日，带去《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记》等五种儒籍经典。所谓五经博士，是指精通五经的学问家。继儒学经典之后，传入了佛教艺

术与经书。关于佛教何时初传日本，众说纷纭。一说是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载，由百济圣明王与大和苏我稻目事前计划，于538年向大和朝廷派使者，携去佛像、太子像的同时，还带去了佛典。另一说据《日本书纪》载，于552年即钦明天皇接受百济送来的“释迦佛金铜佛”和佛典。

汉字和汉籍儒佛经典的传入，给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带来很大的促进，掀起了讲授汉籍和诵读佛典的风潮，成为日本人活用汉籍的文字表达以及吸收佛教、儒学思想的契机。圣德太子引进当时我国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五常儒学思想，以《论语》的“为政以德”作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系，建立官僚制取代氏族的门阀制。他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大量引用《千字文》、《论语》、《礼记》、《易经》、《尚书》、《左传》、《韩非子》等儒学经典，而且广泛吸收《诗经》、《文选》等韵文、散文古典和《史记》等具有文学价值的史书的精神和文章法，乃至不少条文直接沿用了上述我国经典的遣词造句。所以《十七条宪法》虽是成文法，却受到了包括我国古典文学在内的汉籍的影响，语言朴实，文章优美，颇富文学性，代表了当时文章的最高水平。

为了推动推古朝的改革，圣德太子在积极吸收我国的先进儒学文化和制度的同时，大力推进遣隋外交，于推古十五年（607）派出小野妹子等前后五次的遣隋使；推古二十六年（618）唐灭隋后，他继续派出遣唐使（在其后派遣唐使共19次，至894年终止，持续了260余年），带回大批儒佛经典，广为流布，不仅促进了儒学和佛教的进一步传播，也为引进汉文学开辟了道路。推古朝及圣德太子的上述业绩对于日本文化划时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最显著的是，不仅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字文学的诞生，而且所引进的儒佛思想对日本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口头文学到文字文学的过渡期，由于日本没有固有文字，仍需借助汉字来表达，给文字化带来很大的制约，在假名文字未创造出来以前，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之间仍存在断层。但是，大体上以这个时期为界，日本文学从口头传诵进入了文字文学的过渡时期。推古朝以后，传承了大量木简、金石文（即墓碑铭、佛像和铜钟上的刻文）的重要资料，经过长期的努力，至奈良朝终结的200年间，从创造出一种具有口头词章特色的文体，着手编纂《古事记》，到采用多种不同文体编写《常陆风土记》、《播磨风土记》、《日本书纪》、《出云风土记》，这样许多口头文学也就通过这些文字文学而得以流传后世，从而也完成了日本古代从口诵的原始文学到文字文学的过渡。

《古事记》是日本古代文字文学的滥觞，成书于和铜五年（712），分上中下三卷。它既是一部最古的典籍，也是第一部朴素地再现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的书籍。作者太安万侶，史学家。此书是奉元明天皇的敕令而于和铜四年（711）九月开始编著的。此前天武天皇让舍人（侍从）稗田阿礼背诵熟记帝皇的继承和先代的旧辞，但天武天皇于天武十五年（686）驾崩，此事业中断。元明天皇继承天武天皇未竟之业，于迁都平城京翌年，命太安万侶撰录稗田阿礼所诵习的历代帝皇继位之事和旧辞。稗田阿礼向太安万侶口传时，以天皇敕令诵习的旧辞为中心，加上继承的神话传说和相关的原初歌谣，这便成为《古事记》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文学性。

因此可以归纳地说,《古事记》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的内容。卷上,全部是所谓“神代”的事,即旧辞——神话和传说;卷中,叙说“神代”与“人代”间世代,即神武至应神的世代传说;卷下,叙述“人代”即仁德至推古的人皇时代的事迹。也就是说,卷中,从神武天皇东征始到应神天皇驾崩,虚构与史实混杂,有的属于历史传说,不完全是帝纪;卷下,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基本上属于帝纪。

全书由神话传说、古代歌谣和宗谱史传三部分构成。尽管编著的动机不是作为文学作品,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它以朴素的上古神话、传说作为素材,也反映了文学意识的最初抬头。而且在朴素地再现的神话、传说的叙事中,编织了113首上代朴素的歌谣,加强了叙事中的抒情性,也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生活感情。这些歌谣,有祭祀歌、恋爱歌、求婚歌、战斗歌、酒宴歌、送葬歌、思乡歌等,都是与当时先人的生活结合起来的。关于《记·纪》的神话、传说和歌谣,上节已述。在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以大国主神(八千矛神)为中心的传说、倭建命的东征和思乡、皇后石之比卖嫉妒天皇他恋、轻太子与轻大郎女的悲恋等的传说中,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想象力,在技巧上运用各种比喻和夸张的同时,编入了许多素朴纯真而又富含感情的歌谣。比如有名的“八千矛神的歌话”就唱出:“张开白皙的双臂,紧紧拥抱柔雪般的酥胸,枕着白玉般的双手,双腿伸平美美地做个好梦。”这种接近浪漫的抒情歌的恋爱歌谣与散文融合的形式,增加了文艺上的叙事抒情诗的性格。同时,作为独立歌的“八云神咏歌”——“云霭腾腾起,出云的八重垣,与妻子共住,造一个八重垣,造一个八重垣”,初含五七五七七歌体的某些要素,不仅孕育着日本民族诗歌——短歌的胚胎,而且涌动着文学意识。这是《古事记》的一个特色。在这里还可以发现其后出现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歌物语”形态的源流的存在。尤其是轻太子与轻大郎女恋爱的故事,插入对歌,以及最后殉情事件的描写,叙事与抒情结合,颇具文学性,开了日本古代此类文学主题的先例。

《古事记》面世8年后,即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又编撰了《日本书纪》全30卷,其中前两卷为神代记,余28卷则是从神武天皇至持统天皇的纪事,按照编年体编著。神代记两卷内容包括神世七代、八洲起源、诸神出生、瑞珠盟约、宝镜出现、宝剑出现、天孙降临、海宫游行、神皇承运等神话、传说。但从整体上说,《日本书纪》不以神话、传说为主,而以记载史实为重,且尊重古传,尽量保持正史的特质。因此作为国史,它比《古事记》较为详尽周密。编撰者特别参考了我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魏志》、《艺文类聚》等大量史籍,采用我国编史的干支纪年法,重视史料,广泛参照和录用《古事记》等日本国内的古文献,比如各氏族的家记、诸寺院的缘起。此外还大量引用我国上述经史诗文的典故和成语,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文选》的语句和修饰词。

这部书具有文学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记载了128首原初歌谣,不仅比《古事记》多15首,而且在与《古事记》重复或类同的58首歌中,对歌的本意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它将本是独立歌的“八云神咏歌”,组合在本文歌中,没有加上说明文字,就使之具有不同的文学意识。书中还首次出现童谣,在皇极纪中讲述苏我入鹿试图暗杀山背大兄,

拥立古人大兄为天皇一节，在逼真生动的叙述中，推出“岩石头上猴烧饭，光吃白米又何妨，斑白乱发似山羊”这样一首童谣，以猴子要烧死山羊来暗喻苏我要弄死老翁山背大兄之意，赋予它文学上的讽刺性并创造了戏剧性结构之美。

总的来说，《日本书纪》更富历史书的性格，作为史书的价值大于《古事记》，然而在文学光彩方面，则略有逊色。但以它的神代的神话、传说以及人皇历代的传说和歌谣为主体的部分，文章的表现之美，还是确立了它与《古事记》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口头文学到文字文学的过渡阶段，它们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第三节 从古代歌谣到《万叶集》

《记·纪》的上古原初歌谣的句数、音数都是不定型的，而且多为偶数句，其形态尚未固定，其后才逐步将没有定型的上古原初歌谣发展为音数定型为奇数五七调的短歌，以及长歌、旋头歌、少数佛足石歌等多种形态。长歌形式在七句以上，最后统一定型为短歌形态。其原则一是从偶数形式到奇数形式，还有就是从长形式到短形式，而且将短形式固定在五七五七七的五句体。从万叶歌整体来说，以短歌为主体的和歌，成为传统的民族诗歌体裁。为有别于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汉诗，故称和歌。可以说，和歌是日本的各种文学形态中最早形成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万叶集》是第一部和歌总集，是上古和歌的集大成，展现了日本上古的抒情文学的世界。

关于《万叶集》成书年代问题，本集无序文记录，古文献也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据后世学者的推测，是经过二次编辑的。第一次编辑是天平十六七年（744—745）间，从卷1至卷16；第二次编辑是天平宝字三年（759），从卷17至卷20。编辑者未详，一说最后的编者是大伴家持。

根据较权威的《国歌大观》记录，《万叶集》收录的总歌数为4516首。万叶歌的体裁多样，其中短歌居多，包括“反歌”，共4200余首。所谓“反歌”，是附于长歌之后，再吟咏一遍长歌的主题，或补充长歌未尽之意，多者附上五六首。另长歌260余首、旋头歌60余首、佛足石歌体1首、汉诗4首。

歌人网罗所有阶层，从天皇、皇后、皇族、王族、朝臣到士兵、农民、村姑、乞丐等，但以上层者居多。题材和内容广泛，包括杂歌、相闻歌、挽歌、譬喻歌、戍边歌、有由缘杂歌、羁旅歌、四季相闻或四季杂歌、从驾歌、东国歌等，反映了不同阶层和不同地方的情况。这些歌都是上古大和文明的真实写照。

万叶歌形成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万叶假名出现，这对于《万叶集》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受汉诗的影响，万叶歌体的规范，是在汉诗五言、七言的启发和影响下，整合成五七音的形式而形成的；同时模仿中国汉赋的反辞，在长歌之后又添加了反歌。反歌的

产生,促使长歌衰微而逐步让位于短歌,从而短歌成为和歌的主体。还有,歌的序和题词全部使用汉文,歌题参照中国汉诗的分类法,由此可见,万叶短歌的形成,与中国的汉诗有着密切的关系。

《万叶集》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1) 第一时期,通称为“初期万叶”,前期范围包括最早的仁德天皇时代(313—399)的磐姫皇后思天皇御作歌、轻太子和轻大郎女的恋歌、雄略天皇时代(457—479)的“天皇御制歌”等,古风古调,保持口诵时代歌谣的浓重的痕迹,尚属《记·纪》歌谣阶段的歌。后期从舒明天元(629)至壬申之乱(672),共计44年,主要歌人有舒明天皇、齐明天皇、天智天皇、有间皇子、额田王、石川郎女等,他们几乎都是皇族、朝臣,他们的歌主要赞颂神权、皇权和宫廷的悲恋,与当时的皇亲政治和宫廷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大多体现了叙事歌的歌风。比如,舒明天皇时代(629—641)的《天皇登香具山望国时御制歌》,齐明天皇时代(655—661)的《有间皇子被处死时作的自伤结松枝歌》和天智天皇时代(662—671)围绕天智、天武天皇争恋额田王的歌,则较具代表性。这时期是《万叶集》创作歌的孕育和诞生期。

(2) 第二时期,壬申之乱后(673)至平城京迁都和铜三年(710),共计38年。代表歌人是天武天皇。他在上古歌谣的基础上创作了代表作《入吉野御制歌》,虽然还留下上古歌谣的残影,但已显露个性的意识。这一时期,从上古歌谣的土壤中吸取养分的同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效仿中国宫廷兴起侍宴从驾、集宴游览的风尚,在新辟的这种贵族教养的抒情场吟诗作歌,开始树立自我个性的抒情新风。此时出现了天武天皇时代(672—686)的十市皇女的歌、持统天皇时代(687—696)的持统天皇的歌、柿本人麻吕的歌群、《藤原宫御井歌》,以及当朝皇子皇女的创作歌,还出现了许多身份低的宫廷歌人的独咏歌,内含不少四季行事的歌,这些都有利于培育个人抒情歌的成长、美意识的萌芽,以及增加季节感的表现。这时期最大的宫廷歌人是柿本人麻吕,他既是继承上古歌谣要素的最后一个歌人,又是最先开辟万叶长歌的一个歌人,他受到汉诗的启迪,整合五七反复音数律,固定末尾五七七句法,并附反歌的新的表现形式,为长歌的成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歌形式在这一时期处在全盛期。

柿本人麻吕的抒情歌,尤以挽歌最为优秀,比如《哀吉备采女死之歌》、《哀赞岐狭岑岛石中死人之歌》、《见香具山尸悲恸哀作歌》等,这些对庶民死者的挽歌,首创了浪漫的抒情歌风。在他的挽歌中,《妻死之后泣血哀恸作歌》二首并短歌是最典型之作,其中一首并反歌是:柿本朝臣人麻吕,妻死之后泣血哀恸作歌:哀哀切切长相思,门外池前手携手榉树荫下双欢杨,汝我意浓情更长我与妹子相依偎,奈何世间竟无常郊野一片荒茫茫,白幡招魂来丧葬清晨鸟儿离巢去,夕阳尽落不见归遗孤饥饿淘淘哭,乳汁哺育我难当汝夫腋下拥孤儿,独居昔日同衾房白日难熬夜更长,万般无奈徒悲伤人云妹子今尚在,羽易山上来寻访旧日倩影在何方,不见伊影空断肠(卷2~210)。反歌:去岁秋夜明月光,去年今朝一样明去年此夜逢妹子,如今相隔已一年(卷2~211)。

同时期，稍后的代表歌人高市黑人、长意吉麻吕与柿本人麻吕不同，他们没有创作长歌，而在短歌方面创造了咏自然和思乡歌，他们的叙景歌充满了大自然的生命律动，思乡歌则飘溢出一股淡淡的哀愁感，丰富和发展了文武天皇、持统天皇时期以来的从驾歌，使这些歌更具独特的个性意识。在皇族方面值得注意的歌人有志贵皇子、大津皇子、大伯皇女、穗积皇子、但马皇女、弓削皇子等，他们的歌与前期的歌有一定的传承性和连续性，大多歌颂爱与死的主题，同时还开始关心这一主题的物语性，出现了“歌语”的倾向，其传统流贯于整个万叶时期。所谓“歌语”，是颂歌与歌相关的故事，其后这种形式发展为“歌物语”。

从此，长歌和短歌兴隆，扩大了杂歌、相闻歌、挽歌等领域的和歌素材，拓展了歌的多样性。同时，从类同性的歌谣向富有个性的创作歌发展，从而完成了歌谣到抒情歌、口头文学到文字文学的过渡，确立了短歌形式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可以说，以柿本人麻吕等一批中下层宫廷歌人的创作歌群为标志，进入了确立日本民族诗歌的典型形式——和歌的关键时期。

(3) 第三时期，自和铜三年(710)平城京迁都奈良至天平五年(733)，共计24年。开始了万叶的新时期。神龟三年(726)出现了新的变革。日本和歌史上新旧交替，歌人辈出，著名歌人有笠金村、高桥虫麻吕、山部赤人、车持千年、大伴旅人、山上忆良、大伴家持等。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虽然仍继承前期柿本人麻吕的宫廷赞歌的传统，但是，无论在赞颂天皇方面还是吟咏自然方面，都更多地注入了主观色彩，而且关注最富人性的生活，比起前期观念性的歌来，更多的是趋向主观的感受性，强化歌的抒情性。具有代表性的，如笠金村，他的挽歌没有因袭前人而是以自己的意趣和技巧，抒发自己的感怀，为这一时期树立了与前期不同的新歌风。

值得注意的是，万叶歌逐渐走向了多样化。比如其主要代表歌人山部赤人的叙景歌的优美化，大伴旅人的人生颂歌的情趣化，高桥虫麻吕的传说咏歌的多彩形象，以及山上忆良的对人生的执着和对社会的关心等。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贵族知识分子接受汉学的熏陶，汉诗文造诣颇深，都接受中国典籍的影响，以此作为创作歌的基础，个性更趋向多样化，创造了许多在和歌史上不朽的作品。在哀歌方面，悼念亡妻的歌，颇具丰富的个性。

尤其是山上忆良晚年的歌，更多地关注人，接触农民的实际生活，探求人生的意义。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贫穷问答歌》(卷5~892)，富有思想性，在万叶歌中独放异彩。贫穷问答歌一首并短歌：朔风瑟瑟雨雪飘，饥寒交迫实难熬，且嘴粗盐噪糟酒，频频咳嗽鼻涕流，捋捋稀须我自夸，世间除我有谁能寒冷透骨实无奈，扯件麻衣蒙头盖搜尽坎肩披在身，浑身还在打哆嗦，人间贫者何止我，如此寒夜如何过父母饥寒妻子泣，乞讨日子怎能熬。天地虽大难容身，日月虽明难照我人间皆然抑独我，我亦人也同劳碌无棉坎肩披在身，破破烂烂如海藻矮屋地上铺稻草，父母妻儿挤成团，锅结蛛网灶无烟，饥肠辘辘似泉叫呻吟悲叹一整夜，里长执棍门前哮人间世道实艰难，呼天叫地又奈何受尽人间耻与辱恨非飞

鸟无路逃。

这首《贫穷问答歌》，长歌前部分是贫问，后部分是穷答，最后的短歌虽无标出，似是反歌。这首歌吟咏农民在横征暴敛下的贫困的悲惨现实和世态炎凉，字里行间表达了歌人满怀的悲情，将他的“为人生”的文学思想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将歌人的感情抒发提升到仁爱的思想水平。这首歌没有停留在个人感情（包括对自己、对父母妻儿）的抒发上，而是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贫穷者的身上，体察他们的饥寒，表达了对弱者深切同情的志向。他是以“述其志”作为抒情歌的自觉，是含有一定的批判意识的。所以他有“人生派”或“社会歌人”之称。歌中语句很明显地典出我国古典的“经世思想”。

在山上忆良以后，即进入奈良时代，短歌有了长足的发展，占压倒性多数。可以说，这时期歌人的文学意识觉醒，他们的短歌完成了艺术化、个性化，进入了多彩的时期，也是万叶歌的全盛期。

（4）第四时期，自圣武天皇天平六年（734）至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共计26年，正处于奈良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歌垣。这一时期，继山上忆良、大伴旅人之后创作歌的数量最丰的是大伴家持。他的歌日记，以及与笠女郎、坂上大嬢等女性的相闻赠答歌，都表现了纤细的感受性，创造了非现实的心象风景，达到了烂熟的程度。除了笠女郎、坂上大嬢之外，女歌人辈出，她们以恋歌为中心，留下了许多秀歌，吟咏人生的哀乐。其中尤以坂上郎女最为活跃，她的歌以相闻歌、宴歌、祭歌居多，还创作了不少与大伴家持的赠答歌等。

这时期，歌作者的范围不仅限于皇族和宫廷歌人，而且扩大到近畿地方的庶民。一些近畿地方以外的东国地方歌和戍边人的戍边歌，大多是无名氏歌人创作的，占有这一时期的重要位置。

概括地说，《万叶集》各个时期的歌的变化，有其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在集团性的与个性的、神世界的和人间世界的、叙事性的和抒情性的两者相克相融中展开的。从持统天皇时代至奈良时代中期的歌算是最多也最成熟，成为《万叶集》的主体，确立了它在民族抒情歌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稍早面世的汉诗集《怀风藻》一起成为日本上古奈良时代抒情诗歌的双璧，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章 贵族社会与散文文学

第一节 散文文学的诞生

平安时代（794—1192），日本逐步完成了从古代律令制向庄园制这一封建社会新体制的过渡。至10世纪平安时代中期，以藤原家为代表的豪门贵族垄断摄政、关白的职位，夺取天皇的权力，由皇室外戚左右国政，形成王朝贵族政治，史称摄关政治。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化继续接受中国唐代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是汉文学最灿烂的时期。这一时期，沿袭上代作风，继续派出遣唐使。宽平二年（890），学者、诗人出身的右大臣菅原道真向朝廷上奏，建议停止派出遣唐使，并于同年获准实施，以此削弱汉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两国的交流逐渐减少，日本逐渐消化汉文化和文学，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平安文化，完成了从“汉风化”到“和风化”的过渡，日本文化和文学走向成熟。

从“汉风化”走向“和风化”，就是日本古代文学吸收消化汉文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平安时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其重要的标志是：确立“和魂汉才”的主体思想。菅原道真率先呼吁“非和魂汉才不能阙其闾奥矣”。其后《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主张：“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这奠定了“和风化”的思想基础。日本文字实现了日本化。日本从五六世纪引进汉字，于9世纪后期开始创造日本的民族文字——和文（假名文字），逐渐摆脱汉文体的束缚，将汉字完全日本化，当时的物语文学的和文率达90%以上。文字与日常语言的统一，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日本人的思想感情，更有利于民族文学和日本美的创造。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古代散文文学，最早出现了“物语”这个文学模式。所谓“物语”，是将发生的事向人们细说的意思。从文学文体来说，也就是说话文体。它是将日本化了的文体与和歌并列使用而创造出来的，它是日本最早的小说模式。

物语文学最先分“传奇物语”与“歌物语”两类。传奇物语的代表作《竹取物语》，是对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加工和创造，增大其虚构性，赋予浪漫的色彩，并加以艺术的润色，提炼成比较完整的故事。它是日本最早的一部以散文为主，适当并列使用和歌的物语作品。出书年代未详，有各种推测，上至弘仁年间（810—823），下至天历年间（947—959），相距一世纪之遥。故事记述伐竹翁在竹筒中发现一个三寸长的小人，带回家中，盛